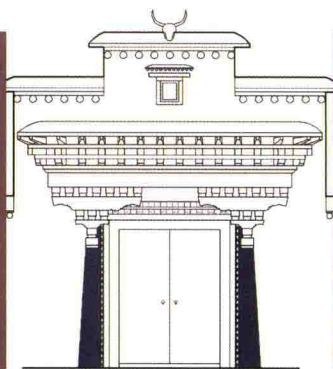


“绿色乡土建筑研究”系列丛书

西藏乡土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Architectural Culture Research of Tibetan Vernacular Hous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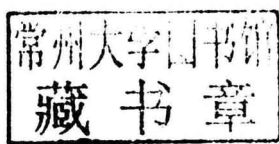
何 泉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究”系列丛书

西藏乡土民居建筑 文化研究

何 泉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藏乡土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 何泉著.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9

(“绿色乡土建筑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112-21039-8

I. ①西… II. ①何… III. ①民居—建筑文化—研究—西藏 IV. ①TU2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0813 号

基于特殊环境而产生的西藏民居, 在乡土社会构建了一个“神人共居”的空间系统, 和谐地统一了天(气候)、地(地理)、人(居者)、神(宗教)等多方面的因素, 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居住者面对高原特殊环境时的生存压力。本书从长期积累的、不易改变的民族心理和宗教观念入手, 选取了一些对藏族民居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问题, 如自然观、宇宙观、洁净观、安全与领域、生态智慧等, 作“他者文化”的观察和研究, 最后解析了一个藏族聚落实例, 试图揭示出藏族居住模式中所蕴含的特有文化逻辑和行为规则。这些根植于藏民族深层意识中、仿佛基因一般的文化内核, 作为一种内在力量潜在地左右着藏族民居有形的空间构成与建筑形态, 使藏族乡土民居表现出与整体环境的某种协调和融合的关系。

责任编辑: 石枫华 李杰

书籍设计: 京点制版

责任校对: 王宇枢 李欣慰

“绿色乡土建筑研究”系列丛书 西藏乡土民居建筑文化研究 何泉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海淀三里河路9号)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京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8½ 字数: 164千字

2017年11月第一版 201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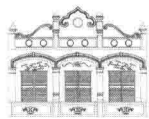
ISBN 978-7-112-21039-8

(3056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前 言

西藏是我国重要的边陲之地，这里平均海拔在 4000m 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和“地球第三极”，其西南缘有喜马拉雅山脉围合，北有截然分开的昆仑山与新疆盆地，东有横断山脉及其水系与内地隔开。连绵不绝的雪山冰峰的环绕，以及高寒缺氧的荒漠高原的阻隔，形成了西藏相当艰险的交通条件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从任何方向进入西藏都是艰难的，因此这里长期以来被外来者视为畏途。

与众不同的宗教信仰更增添了西藏的神秘色彩。对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产生深刻影响的藏传佛教，是藏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其起源、形成和发展与印度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也曾受到藏族本土宗教——苯教的巨大影响，从而形成了一种与西藏地方息息相关的宗教，具有鲜明的不同于其他佛教支派的高原特色。几千年来，由于西藏地处高原，文化生态处于半封闭状态，能够较好地抵挡、消解外来文化的侵袭，因此藏传佛教在传承过程中保持了良好的独立性及民族性，呈现出一种相对纯粹的表现形式，成为世界多元文化资源中的瑰宝。

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宗教信仰，加上青藏高原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共同构成了西藏的整体地域特征，也造就了特色鲜明的藏族民居建筑文化。不论是拉萨、山南、日喀则的碉房，还是林芝的坡顶木构宅屋，抑或是牧区的帐房，都弥漫着浓郁的区位特点。

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起，全球化的浪潮波及西藏，虽然给这里带来了生活和交流的便利，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却越来越脱离地域文化，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全球化造成了人与传统地域空间的分离，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特色逐渐衰微、消失，导致了令人担忧的“文化趋同”现象。许多跨国家、跨地区、跨文化，具有很强普适性的现代建筑传入藏区，尽管其形式适应了大部分的现代建筑使用功能，却使得具有强烈的高原特色和魅力的西藏传统建筑遭受了很大的冲击。以藏族人奉为“圣城”的拉萨为例，如今，建筑物的标准化和商品化致使城市特色逐渐消退，和内地一般无二的现代建筑在拉萨已随处可见，即使在布达拉宫附近也不例外，西藏传统建筑文化和城市文化出现了特色危机。

与此同时，由于藏区的建筑设计缺乏理论指导，简单的“风格论”替代了对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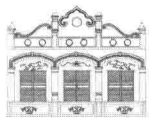
族建筑文化的深度探讨，因此导致近年来许多职业建筑师设计的现代藏式建筑以视觉符号为依托，停留在形式的模仿阶段，如采用收分的墙体、黑色的窗套、红色的檐墙等。我们必须承认，相似的外观聊胜于完全颠覆的再造，这些设计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西藏地区的民族风貌，但乡土建筑中隐含的一些不易察觉的文化内涵也在不经意间悄悄地流失。外在的、符号性的物质外壳由于缺乏内在的民族文化特质，逐渐造成了建筑与地域环境之间的貌合神离。

藏族传统民居能延续至今并充满文化魅力的原因在于，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其形态演变经历了类似于“自然选择”过程的磨砺和筛选，当中充满了巧妙的组合和意味深长的意象。它们不仅创造了与自然环境的完美融合，更营造了理想的人文环境，为现代建筑设计提供了如何与气候、地形、文化传统相适应的借鉴与参考。如果不能深层次地理解民居中蕴含着的超越形式和功能的文化含义，透过表面的形式去探索内在的精神实质，就无法在现代化进程中赋予它新的生命力。

本书由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精简而成，论文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藏高原节能居住建筑体系研究”的支持。在一个以节能技术为主的课题下研究藏族民居文化，是出于这样一种认知——不应以现代化的名义摒弃传统建筑文化，民族地区的民居更新、节能优化离不开当地的地域条件和历史背景。这一理念源自导师刘加平院士几十年来对民居潜心研究的心得。刘加平先生广博的胸怀、严谨的治学态度、独到的学术见解，均让我受益匪浅，从先生那里获得的人生智慧难以尽述，谨在此表示深深的感激。

西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宗教典籍卷帙浩繁，是本人学识范围所不及，有鉴于此，笔者仅仅从一个外来者、一个汉族研究者的角度，选取一些对藏族民居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问题作“他者文化”的观察和研究，试图超越对民居物质形态特征的简单“展示”，而是探究形式发生的深层原因，发掘蕴涵于藏族民居中的文化逻辑。

本书是在大量已有的相关资料和实地调研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因此对于本人所参考、引证过的所有文献、图片的作者在此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此外，还要特别感谢西藏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索朗白姆老师在调研过程中给予的热忱帮助。



目 录

前 言

第 1 章 藏族民居的产生背景与类型	1
1.1 自然生态要素	1
1.2 社会文化要素	4
1.3 藏族民居类型和特征	9
第 2 章 自然观	19
2.1 自然崇拜的起源	19
2.2 藏族的“自然崇拜”观	20
2.3 藏族自然观与建筑文化	29
第 3 章 宇宙观	33
3.1 藏族空间观与建筑文化	34
3.2 藏族时间观与建筑文化	42
第 4 章 洁净观	49
4.1 洁净观与净化仪式	49
4.2 藏族洁净观与建筑文化	53
第 5 章 安全与领域	64
5.1 持久防卫的民族心理	64

5.2 藏族聚居环境的防卫机制.....	67
第6章 生态智慧	80
6.1 传统藏族民居的总体布局.....	81
6.2 传统藏族民居的单体营建.....	84
6.3 传统藏族民居的生态建筑模式语言	94
第7章 拉萨藏族聚落实例	99
7.1 次角林村概况	100
7.2 次角林村聚落与民居	101
7.3 次角林民居建筑文化特征.....	108
结束语	120
参考文献	122
图片来源	127

第1章 藏族民居的产生背景与类型

藏族主要聚居在我国的青藏高原，以行政区划来说，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西南部、甘肃省南部，以及四川省和云南省的西北部。在历史上被划分为三大地理区域，即上部的阿里、中部的卫藏（今西藏自治区的大部分地区）、下部的朵康（今甘肃省、青海省、四川省的大部分藏区）。其中卫藏又可分为前藏和后藏，前藏包括拉萨地区和山南地区，后藏包括日喀则地区及藏西北地区。

本书所涉及的主要范围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地区。西藏自治区面积 123 万 km^2 ，约占全国总面积的 1/8，平均海拔 4000m 以上，是青藏高原的主体部分。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西藏自治区总人口约为 300.22 万人，其中藏族约占 90.48%，其他为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怒族等。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地域文化都是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与乡土建筑文化相关的地域要素，涉及自然环境（地理、气候、生态等因素）和社会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传统风俗等因素）两个范畴的多元组合。

1.1 自然生态要素

1.1.1 崎岖复杂的地形地貌

辽阔的青藏高原被称为“世界屋脊”，主要是由于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这里绵延横亘着许多世界著名的高山，海拔在 4000m 以上的山峰有千座以上，最著名的包括耸峙于西南边的喜马拉雅山，绵延在北侧的昆仑山，耸立在西北侧的喀喇昆仑山，以及东南部的横断山，中部的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和念青唐古拉山，它们形成了青藏高原的基本骨架。

西藏总体地形构造是夹在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 - 唐古拉山这南北“两道高墙”之间的，西北高、东南低的三级阶梯，即①藏北高原，约占西藏面积的 2/3，平均海拔在 4500m 以上，除西南角的几条河以外，多数是内流河，形成众多的高原湖泊；②雅鲁藏布江流域，平均海拔在 3500m 左右，河流都汇入由西向东的雅鲁藏布江；③藏东峡谷地带，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到金沙江，平均海拔在 3500m 以下，地势北高南低。

因为西藏地形复杂,山高水急,长期以来各城镇之间仅有崎岖的山路相连。元、明、清时期,西藏与内地之间曾建官道和驿站。由于雪山重重,高山缺氧,江河难涉,加上维修问题,这里的交通极为不便。雍正十年(1732年)王世睿在西藏的艰辛经历仅为一例:乍丫^①西行三十里“至雨撒,过雪山。山之高不过里许,东则山腰委折,自顶以西,雪路褊窄,宽仅尺许,深不计尺。由山半直行而西,则下临无地。由西转南,层层折下,雪路多坎,陷马蹶不能行。即徒步,时防蹶跌焉”。^[1]那时传统的运输方式靠人背畜驮,渡河靠牛皮船和木船,轿子和马匹仅是上层贵族的短途交通工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先后修建了川藏、青藏、滇藏公路,区内各城镇之间也修建了公路,落后的交通方式才得以改善。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以后,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变得更加便捷。

起伏崎岖的地形地貌对西藏传统聚落景观的影响十分明显,一方面村落的选址和民居建设都与自然的地形地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相互因借、相互衬托。另一方面的影响则表现为对建筑取材的限制,由于地形复杂,交通运输不便,民居营建便就地取材。盛产土石的卫藏地区木材稀少,则民居建筑多石木或土木的混合结构;林芝地区木材丰富,则民居多为坡顶的木质结构:均表现出了强烈的地域性特点。

1.1.2 严寒恶劣的气候条件

西藏气候复杂,从雅鲁藏布江下游河谷到羌塘高原,气候条件变化很大,依次有低山热带、山地亚热带、高原温带、高原亚寒带、高原寒带等气候带。

这里空气稀薄、大气干洁,太阳总辐射高达 $5400 \sim 7900\text{MJ}/\text{m}^2$ 年,比同纬度低海拔地区高 $50\% \sim 100\%$ 不等。但由于海拔高,喜马拉雅山脉挡住了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北上,海拔 4500m 以上的高原腹地平均气温在 0°C 以下,有大片面积最暖月平均气温低于 10°C ,所以寒冷和干燥是其突出的气候特征。拉萨1月平均气温为 -2.2°C ,7月平均气温为 15.1°C ,那曲1月平均气温为 -13.9°C ,7月平均气温为 8.9°C ,绝大部分地区年均温度在 10°C 以下,拉萨、日喀则的年平均气温和最热月气温,都比同纬度的重庆、武汉、上海低 $10 \sim 15^\circ\text{C}$ 。整个青藏高原冬季漫长,无霜期短,拉萨和日喀则无霜期为 $120 \sim 180$ 天,那曲地区仅有 $60 \sim 80$ 天,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夏季。降水量少而且集中在7、8两个月,年降水量拉萨为 453.9mm ,阿里噶尔镇为 60.4mm ,那曲为 406.2mm 。冬、春多暴风雪,夏季多雷暴、多冰雹。西藏又是多风的地区,年平均大风(8级以上)天数拉萨为 32.4 天,日喀则为 59.3 天,而

① 今西藏察雅县,位于西藏自治区东部、昌都地区中南部。地处横断山脉北段,山高谷深,沟壑纵横。

那曲和阿里的牧业区为 100 ~ 150 天,最多的地方可达 200 天。

由于位于低纬度地区,而且海拔高、空气稀薄,大气透明度高,西藏是我国太阳能资源最富集的地区:日照 6 小时以上的年平均天数在 275 ~ 330 天,全年日照时间在 2900 ~ 3400 小时(拉萨为 3100 小时),具有得天独厚的太阳能利用条件。由于白天大量吸收强烈的太阳辐射,地面温度急剧升高,加速了近地面空气的升温作用,即使在冬季,这里在阳光下也会感到温和如春;日落后,由于空气稀薄、水汽含杂质少,地表容易散热等原因,地面热量大量向空中散失,使近地面气温迅速下降,因而,青藏高原上气温日较差比同纬度低地区大 1 倍左右,具有一般山地与高山的特色。如拉萨、日喀则等地年平均日较差均在 14 ~ 16℃。与此相比较,北京、西安为 10 ~ 12℃,成都、武汉、南京为 7 ~ 8.5℃。^[2]

1.1.3 植被分布的垂直特征

由于藏区高山环绕、高差悬殊,因此垂直自然带普遍发育,可以归纳为季风性系统与大陆性系统两类性质不同的带谱。另一方面,范围巨大的高原受到大的地势结构和大气环流特点的制约,形成了自东南向西北由暖湿至寒旱的水平分异梯度,表现为森林—草甸—草原—荒漠的地带性变化。这种区域差异又和垂直带变化紧密结合,显示出高原的独特性,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自然地理区。高原内部以高寒草甸、草原和荒漠为主体的高原垂直带呈现出水平地带变化并具有强烈的大陆性高原的特色,在本质上异于低海拔相应的自然地带。可以认为高原自然地带是欧亚大陆东部相应水平地带在巨大高程上的变体,由地势和海拔引起的水热条件的不同是变异的主导因素。

山地垂直自然带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生产的条件,山区可更新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及农、林、牧业的布局都与垂直自然带有关。以东南部山地为例,高山带分布着各种类型的灌木丛、草甸,适于牦牛、绵羊放牧。而农田必须有水利灌溉,因此耕地分散在河谷地带,这里海拔较低,光照及温度条件较好,垦殖历史较长,耕地也较集中,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带。两者之间的山地森林带则为人们提供生活与生产上所必需的木材、燃料等,形成农牧交错的广大区域。

从整体来看,西藏的大部分地区是荒漠草原,不适宜农耕,只有小部分气候比较温暖的河谷平原,如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的中下游河段地区,以及朋曲、隆子河、狮泉河、噶尔藏布、麻噶藏布等中游河段地区,由于日照长、土质肥沃、水源充足,具有发展高原灌溉农业的有利条件,但耕地总面积不到 400 万亩(约 26.7 万 hm^2),其他大部分地区为高原游牧区。虽然牧业分布地域辽阔,

但是可以有效利用的面积有限。广大草原牧草生长季节短，产草量低，载畜量低，而且多风雪灾害，生产很不稳定。

1.1.4 生态环境的脆弱敏感

青藏高原长期处在印度次大陆与亚洲主大陆两大板块的强烈挤压中，在南北向挤压力的作用下，导致地壳增厚，同时带来岩层的褶皱、断裂。其断裂构造发育和岩层破碎等不稳定性问题突出。此外，印度板块以 5cm/ 年的速度向北漂移，西藏高原平均每年上升 5 ~ 6mm，喜马拉雅地区上升速度达 8 ~ 10mm/ 年，高原山地的持续上升，使山地坡面物质势能加大，径流冲刷和河流溯源侵蚀纯速率加快。^[3]

并且，受到干旱气候影响，青藏高原土地呈明显的贫瘠特征：87% 的土地在海拔 3000m 以上的高原干寒地带；丘陵、山地、沙漠、戈壁、荒漠占高原土地面积的 3/4 左右；约占高原土地 36.6% 的高山冰川、裸岩、沙漠、戈壁与盐碱地上根本不能生长植物。高寒草甸、草原与荒漠土地面积约 1.2 亿 hm^2 ，占高原土地面积的 54%，构成了高原三大生态系统。由于土壤层薄、质地粗疏、砾石量高、土壤有机质积累相当缓慢，所以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极易退化。^[4]

1.2 社会文化要素

1.2.1 农耕为主的生计方式

藏族从古以来自称“吐蕃”，唐代汉文文献也将 7 世纪初藏族所建立的王朝称为“吐蕃”。现在英语中称西藏为 Tibet，称藏族为 Tibetan，也是“吐蕃”两字的音译。国内外藏学家认为“蕃”在古代藏语中有“农业”的意思。

位于西藏东部重镇昌都郊区的卡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藏族先民居住的原始聚落，在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石锄、石铲、石犁等生产工具，以及各种动物骨骼、粮食、陶器等。遗址的晚期房屋已高度发达，其用途不仅限于人居住的场所，同时还可用于圈养家畜。种种生产工具、粮食、动物骨骼以及人畜共居的房屋的出土，充分表明远在 5000 年前，在海拔约 3100m 的高原地区，西藏高原的先民已经逐渐脱离了动荡的狩猎采撷生活，生产活动从单纯的狩猎发展到以农耕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的定居生活。

拉萨曲贡遗址是继卡若遗址之后，西藏境内第二次发掘出来的新石器遗址，其年代大致为距今 3500 ~ 4000 年。曲贡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如双肩石铲、石斧、

石磨盘、网坠等,说明当时曲贡文化的主人过着定居生活,占主导地位的是农业生产,畜牧业也占有较大的比重,还同时存在狩猎业和渔业。

上述遗址发掘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的不同地带,相继或同时孕育出了古老的农业文明。不论是昌都卡若人,还是拉萨曲贡人,虽然主体都是以农业定居为主,但是其经济形态均表现出一定的广泛性,这是居住地的自然环境使然。西藏高原上无法纯粹依赖于农业,通常还需要蓄养一定的牲畜,这是人们增加食物获取量的必要手段。如元代在西藏规定的“户”的概念,表明了当时农牧结合的经济形态:“有六根柱子面积的房子,有能下十二蒙古克种子的土地,有夫妻、子女、仆人共计六人,牲畜有乘畜、耕畜、乳畜三种,山羊、绵羊等,计有二十四只,这样一户人家称为一个蒙古户。”^[5]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生存依赖,是原始聚落即固定村庄产生的缘起。定居的生活方式使人们有了长远的计划和目标,促进了建筑的发展,也强化了人们的群体意识。

1.2.2 混杂融合的民族文化

氐羌是远古时代生活于西北高原的游牧民族,是氐和羌的合称,指同一游牧部落中的不同部分,古代文献中经常以“羌”作为对氐羌的泛称,称之为“西羌”。氐羌由众多游牧部落组成,长期处于迁徙游动的生活状态,这些古老的部族“散处河、湟、江、岷间”,与其他民族多有融合。其中有的逐渐远向西迁,被认为是后来藏族源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关于吐蕃是否源于西羌还存在着学术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羌藏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正如费孝通教授所说,“即使不把羌人作为藏族的主要来源,羌人在藏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是无可怀疑的”。^[6]藏族人类学博士格勒依据历史文献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材料进行综合论证,认为藏族无论从血统还是文化上都不是单一的,在原始时代就与中原地区氐羌系统存在着相互交流和融合。^[7]目前关于藏族起源普遍公认的学术观点是,“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的羌人原始部落,经过迁徙发展,在吐蕃北面、西面先后组成吐谷浑、苏毗、羊同、白兰、党项、嘉良夷、东女国等部落国家,最后被强大的吐蕃王朝征服,经过同化融合,形成一个具有共同地域、语言、经济、生活习俗等的民族共同体,即自称为“蕃”的藏族。因此,藏族古代文化具有明显的混杂融合的特征,既有藏族地区本土的地区性特点,又包含着中原氐羌系统的原始文化特点。

这种民族文化的混杂融合清晰地反映在建筑形式上。如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建筑形式的演变序列显示出,它与中原地区建筑的共性特点是主要的,只是到了晚期

阶段才呈现较明显的不同个性特点(图 1-1)。古羌人有戴羊角的习俗,羊角进而演变成崇拜物。《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多事羴羴之神”,《新唐书·吐蕃传》也说“其俗重鬼右巫,事羴羴为大神”。这里“羴”指大角的羊,“羴”指牧羊。可见藏族在 1000 多年前就尊大角羊为神,至今仍保留着这种习俗,将羊头供奉于门头。另外,古羌人有尚白、崇白之俗。北宋·杨仁在《谈苑》里说:“羌人……以心顺为心白人,以心逆为心黑人。”《四川少数民族》一书介绍羌族说:“羌族崇拜的神多达三十几种,都是以白石为代表,供奉在山上、屋顶、庙宇”。^[8]而藏族对白色也充满崇拜和喜爱,并保留有供白石于屋顶的习俗。



图1-1 卡若遗址与中原地区建筑演变的对比

1.2.3 动荡不安的社会发展

藏族先民的部落群经过数千年的迁徙、发展和分化组合,形成大大小小数十个部落联盟。据《汉藏史集》记载:“从猴崽变成人类,并且数量增多以后,据说统治吐蕃地方的依次为玛桑九兄弟、二十五小邦、十二小邦、四十小邦。”每个小邦居住在一个堡垒内,由一个王和家臣统治,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同时兼营畜牧和狩猎。历史上几千年的部落小邦时期战乱频繁,社会极其动荡不安,《贤者喜宴》记录了“小邦喜欢征战残杀”的历史特征。

直至唐贞观七年(633年),松赞干布建立了奴隶制的吐蕃王朝,部落小邦时代宣告结束。其后,他不断对外用兵,征服统治了“剑南西山诸羌”地域境内的众多部落,逐渐统一并巩固了青藏高原。与此同时,松赞干布与尼泊尔和唐朝的联姻增加了吐蕃与南亚和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佛教在王室的支持下得到了发展,这一时期被称为西藏佛教史上所谓的“前弘期”。

统一的吐蕃历经了近两个半世纪的稳定时期,末代赞普朗达玛进行的灭佛活动激化了佛、苯矛盾,最后他于842年被佛教徒刺杀,吐蕃王朝内部发生了分裂,各地相继发生混战和暴动,终于使强大的吐蕃王朝四分五裂。自此西藏出现了400多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大约从9世纪中叶至13世纪后半期。

在卫藏地区,吐蕃奴隶大起义推翻了奴隶制,藏族社会逐渐进入了封建农奴制社会。奴隶主被消灭以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各不相属的农村聚落在河谷地带发展

起来,但氏族势力仍在起作用,小生产者的地位极不稳定。动乱中存留下来的贵族势力和寺庙集团,形成了一个割据势力,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僧俗联合,政教不分。1253年,元朝将西藏纳入版图,地方政权中心设在萨迦。

从10世纪后半期起,融合了苯教色彩的西藏佛教在新兴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扶持下得到发展,开始了西藏佛教的“后弘期”。这一阶段西藏佛教和地方世俗势力结合,产生了不同的宗派集团,如“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等。各教派都在农牧业发达、人口集中的地区建寺,形成了一个文化中心。各封建势力通过教派为自己的利益争斗,甚至动用武力。13世纪以后,宗喀巴在噶当派教义的基础上,吸收了其他教派的一些内容,创建了“格鲁派”(黄教),严格了僧人戒律,广泛与各地方势力结合,摆脱了单一世俗领主对寺院经济的操纵。各教派之间的争斗持续到17世纪中叶,共600余年,直到格鲁派寺院集团在藏族社会上取得绝对的优势地位为止。

1.2.4 双重属性的宗教信仰

藏族全民信教,宗教气氛极为浓厚,寺庙聚集,僧尼众多。宗教渗透到了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从出生到死亡,从生产到生活,从家庭到聚落,无处不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和支配,宗教成为西藏传统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

藏族的自然宗教——苯教,又称“苯波教”。作为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苯教自始至终伴随着吐蕃王朝的整个历史进程,对早期藏族社会的文明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藏族宗教史籍中记载,从第一代吐蕃藏王聂赤赞普到第二十七代藏王拉脱脱日聂赞,均以苯教治国。^[9]吐蕃宫廷中有专门占卜吉凶的官职,由苯教徒担任,借机参与政治事务。

苯教早期崇拜内容可归纳为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生灵崇拜、图腾崇拜、灵物崇拜、祖先崇拜等,并崇尚念咒、驱鬼、占卜、禳祓等仪式。《旧唐书·吐蕃传》记载苯教“其俗重鬼右巫”,吐蕃王朝在举行会盟大典时,要“会巫者告于天地、山川、日月星辰诸神”,说明了它崇拜鬼神、崇尚巫术以及崇拜自然万物的特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氏族社会的嬗变演绎,对守护神和神灵的崇拜逐渐成为主要的信仰。苯教仪轨非常盛行通过杀牲以起到镇压恶灵、趋吉避凶的作用。民族学调查的资料还表明,防雷、祈雨、驱邪等巫术也是藏族民间苯教仪式的重要内容。

7世纪中叶松赞干布时期,佛教分别从中原、印度、尼泊尔同时传入吐蕃。中原传入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印度、尼泊尔传入的主要是佛教密宗。8世纪天竺僧人

寂护、莲花生等到西藏传播佛教，和苯教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为了更好地融入藏区，莲花生以佛教的世间神的理论，将西藏原来信奉的山神、湖神、龙神等纳入大乘佛教的神灵体系之中，成为护法神，并吸收了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苯教的很多仪轨。至此，藏传佛教形成并蓬勃发展，成为藏族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论支撑，对藏区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天文、医学、建筑等领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西藏佛教本地化的同时，苯教为了对付佛教的强大理论攻势，也吸收佛教的内容来充实自己的理论体系，将大量的佛教经典篡改为苯教的经书，诸如将《广品波若》改为《康勤》、《二万五千颂》改为《康穹》、《瑜伽师地抉择分》改为《苯经》、《五部大陀罗尼》改为《白黑等龙经》，等等。^[10] 这样苯教从最初的崇拜天、地、日、月、星辰、雷电、山川等自然现象的自然宗教，逐渐发展成了拥有众多富于哲理的经文以及系统化的教规仪轨的人文宗教。

以上两种宗教文化在西藏的影响具有双重属性，这种影响可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于1956年在其著作《农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中首次提出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来说明。在他看来，复杂社会中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大传统”指的是以都市为中心，社会中少数上层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小传统”则指散布在村落中的多数农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传统还可以被称为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民间文化与正统文化、俗文化与雅文化。^[11] 这一对概念的提出，在人类学界引起了争论，同时也使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欧洲学者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雷氏的大传统与小传统进行了修正。中国台湾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将这一概念运用于中国文化研究，将大传统、小传统与中国的雅文化、俗文化相对应。这里雅、俗也只是约定俗成的称谓，并不一定有高低之分，前者的知识体系为少数精英所掌握，后者的知识体系为普通民众所认同。“在小传统的中国民间文化上，追求和谐均衡的行为表现在日常生活中最多，而在大传统的士绅文化上，追求和谐均衡则表现在较抽象的宇宙观及国家社会运作上。大传统也许较强调抽象的伦理观念，小传统也许较注重实践的仪式方面”。^[12] 这两种传统并非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影响、互渗和衍生的。

藏族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大传统和小传统，可以分别看作是借助于政权传播的藏传佛教和流行于民间的原始信仰。前者以印度佛教教义为基础，融合了本土宗教苯教的仪轨和护法神，通过积累功德达到“来世成佛”的目的是其最高理想；后者指藏族的原始宗教（主要是苯教），在佛教传入藏区后虽受到很大冲击，但并未就此消失，而是渗透到人们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中，其主要作用是通过巫术实现“上祀天神，下镇鬼怪，中兴人宅”的现实功能。如果说藏传佛教为藏民族筑造了一个

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那么深受苯教影响的民间宗教则更直接地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具体矛盾。其相互之间的区别可用表 1-1 概括。

西藏大、小传统的区别

表 1-1

大传统	小传统
民族文化	地方文化
藏传佛教，系统的理论体系	民间信仰（主要是苯教），以自然崇拜为特征的神话、仪式、象征符号
精神追求	实用功利
对僧人和宗教建筑的影响更深	更多地反映在民俗文化和民居聚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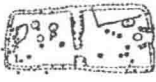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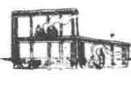
1.3 藏族民居类型和特征

陆元鼎先生曾提出：“人文条件是决定传统民居民族特点的主要因素，而自然条件则是决定传统民居地域差别的主要因素”。^[13] 由于出自同源文化，藏区不同地域的藏族民居均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特色，但仍存在着丰富的多样性差异，此乃是由相差迥异的自然条件塑造的地域特色。藏区地域广袤，气候复杂，藏北部的那曲地区和阿里的部分地区属于寒冷半潮湿型气候，阿里大部所处的藏西地区属于寒冷干旱型气候，拉萨所在的藏中地区属于温暖半干旱型气候，藏东、藏东南、藏南则属于明显的温暖潮湿型气候。气候条件造成了植被的差异，也造成了生活方式的不同，由此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民居形态。

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发掘了大量清晰的建筑遗迹，表明藏族拥有十分久远的居住文化历史。在 1000 多 m² 的遗址范围内密集分布着 31 座房屋基址，分为早、中、晚三期，延续时间约 1000 年之久。早期建筑为半地穴、窝棚式，下部空间挖土，上部空间构筑而成，单式建筑，木构架，坡屋顶；中期建筑为半地穴、棚屋式，居住面逐渐上升到地面，建筑空间增加，个别出现隔墙，包括单室、双室建筑，梁、柱木构架，木骨泥墙为主，坡屋顶；晚期建筑有 5 座，以地面建筑为主，出现干栏式楼居，建筑平面和居住空间逐渐扩大，有分室现象，石墙为主，梁（柱）墙承重，平屋顶。这一建筑发展的过程可用表 1-2 概括。卡若遗址在聚落选址、平面形式、结构构造、柱洞基础、墙身砌筑、地坪防潮等方面，都反映出远在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藏族的民居建筑就已有相当的发展和较高的水平。^[14] 遗址中晚期建筑的石头房屋，是现代石墙平顶的藏式房屋的雏形，因此卡若遗址建筑被认为是藏族民居建筑的滥觞，在卡若遗址之后的几千年演进中，藏族民居不断得以发展、丰富和完善。

卡若文化遗址建筑发展示意

表 1-2

建筑时期	遗址平面图	遗址剖面图	遗址复原想象图	建筑特点
早期				平面近圆形, 沿房四周立明柱, 柱础为扁平卵石, 门口筑挡水土埂
				平面近长方形, 以木骨作墙的围护结构, 墙柱下垫卵石明础
中期				平面近正方形, 木柱构架, 穴壁四周为木板墙, 并出现擎檐柱
				平面四周呈圆角“日”字形, 双室地面建筑, 木构架, 平顶, 兼具居住与公房性质
晚期				组合型, 石墙砌筑、干栏建筑并存, 平面方形或长方形, 底层空间小, 擎檐柱, 平顶, 使用独木梯

资料来源: 江道元. 西藏卡若文化的居住建筑初探 [J]. 西藏研究, 1982, (3): 103-126.

1.3.1 帐房

在牧区, 为了适应“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藏族主要的住居形式是方便迁徙的帐房, 又称帐篷, 古代汉文史籍中被称为“天幕”“穹庐”或“拂庐”。《旧唐书·吐蕃》记载“贵人处于大毡帐, 名为拂庐”, 又有《新唐书·吐蕃》记载“联毳帐以居, 号大拂庐”。清·杜昌丁记述了康熙六十年(1721年)闰六月廿八日观察西藏牧区的情形, “其寒盛夏如隆冬, 不毛之地名雪坝, 山凹间有黑帐房, 以牛羊为生, 数万成群, 驱放旷野”, 说明了牧区严寒的气候和游牧的生活方式。

俗称“黑帐房”的是藏族的冬帐房, 在框架上覆盖“氍毹”, 即用牦牛毛捻成线, 织成厚毡, 然后缝制而成, 其保暖性好, 经得起风雨侵袭。由于牦牛毛呈深棕色, 所以织成氍毹呈黑色。氍毹质软轻柔, 可任意折叠, 与蒙古包用料不同, 蒙古包由毡制成, 系用羊毛经擀压而成, 折叠性差, 只能卷成筒状贮存、运输。